

全球化时代美国史的书写*

——托马斯·本德的跨国史研究

李 敏

【提要】 跨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托马斯·本德依据个人学术经历的发展逻辑,从理论构建和学术实践层面,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重要课题。在民族构建理论的基础上,本德重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批评“美国例外论”,融合跨国视角与综合性叙事,提出比较、关联和语境化三种跨国史研究方法,撰写了《万国一邦》一书。面对学界的挑战与质疑,本德依然认为跨国史是一种未来可行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它丰富了长期主宰美国学界的民族国家史学的内涵。

【关键词】 托马斯·本德 跨国史 “美国例外论”

自20世纪末以来,“美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1944—)一直是提倡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的主要学者,^①同时也是将跨国史研究方法运用到美国历史教学的公共活动家。早在2002年,作为拉皮埃特拉美国历史跨国研究国际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本德编辑出版了《在全球化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史》一书。^②该书增进了美国学界关于跨国历史理论构架和方法论的对话,被跨国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教授誉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概述”。^③2006年,由本德独撰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以下简称《万国一邦》)一书则具体实践了他的跨国史研究主张。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教授甚至直言该书出版问世之后,本德已成为从跨国视角研究美国历史的“最重要的学者”。^④因此,该书一经面世便迅速引发多方热议,将跨国视角下美国历史叙事的讨论推向新的高潮。^⑤自2015年从纽约大学历史系退休以来,本德依然笔耕不辍,借鉴新近的跨国史研究成果,以多种形式回应此前学术界对其跨国史理论构架和方法论的诸多质疑。可以说,本德二十余年的跨国史研究见证了美国跨国史研究的基本发展历程,适合作为观察这一新式研究视角与路径的切入点。

我国历史学界不仅关注本德的跨国史研究活动与主要成果,而且考察他的历史叙事方法。早在1999年,李剑鸣教授在回顾20世纪美国史学的基本趋势时,便提到了本德为扭转史学研究碎片化趋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大西洋贸易与英属新英格兰经济商业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8XS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Johann N. Neem,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Th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Third Series, Vol. 64, No. 2 (April 2007), p. 419.

②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③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4, No. 3 (November 2009), p. 456.

④ Sven Beckert,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2, No. 4 (October 2007), p. 1124.

⑤ 邢承吉《“世界中的美国”》,《读书》2019年第1期。

势而提出的以“公共文化”作为新的整体性叙事策略的设想。^①近年来,随着国内跨国史与全球史研究学术热潮的兴起,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和引用本德及其研究成果。一些学者对这一全新的研究趋势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思考,相关的著译也不断涌现。^②借此热潮,中国学者对本德其人其书的研究兴趣愈加浓厚,或者专门研究他所领导的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运动,或者在梳理美国跨国史研究兴起的过程时,论及他在其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最近又有学者评述与译介他的跨国研究代表作《万国一邦》一书。^③但目前尚未出现关于其跨国史研究历程和具体研究特点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本文在国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本德的跨国史研究历程,借助该领域新近的自我批判性研究,更为全面地把握本德跨国史研究的理论取向,厘清其方法论特征,评判他所遭遇的学术争议与挑战,以期加深对跨国史研究的整体理解。

一、跨国史研究的缘起

本德的治学历程,以20世纪90年代初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他侧重研究美国城市史、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史,同时关照美国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问题;近20年来,他的研究兴趣转向美国历史的跨国研究。这一学术转变不是对20世纪末美国学术风尚的附和,而是其跨国史研究理论构建的自然过程,遵循着本德个人学术思考的发展逻辑,也与美国史学新动向十分契合。

1971年,美国新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是年,专攻19世纪美国工业化、社会福利和城市规划的本德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得博士学位。^④深受社会科学理论影响的本德已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穿越时空的城市”课程,讲述几千年来“城市全球史”。本德后来回忆治学历程时坦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经历成为他“后来所作一切的基础”。^⑤讲述这门为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的城市史课程所采用的宏大的时空视角,为他在二十多年后引领美国学术界从跨国视角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与城市全球史的教学经历相比,本德的美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实践更加深刻地影响其跨国取向与世界主义价值观的构建。从1966年进入研究生院专攻美国城市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史开始,本德的阅读视野中不乏19世纪中叶到进步主义时代那些坚守自由主义与世界主义价值观的美国思想家。^⑥本德虽然认同和接受这些早期思想家的世界主义愿景,但在对纽约知识分子进行专门研究之

①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庞冠群《全球史与跨国史:法国革命研究的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1期;徐国琦《作为方法的“跨国史”及“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2017年第7期;王立新《跨国史的兴起与20世纪世界史》,《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跨国史与全球史作品的翻译情况参见杨钊:《理论反思与研究深化——2018年全球史著作盘点》,《中国图书评论》2019年第2期。

③ 孙岳《“美国史全球化运动”评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托马斯·本德《把美国放到世界史中》,孙岳译,《全球史评论》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文明《跨国史:概念、方法和研究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孙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④ Bruce M. St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omas Bender”,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14, No. 4(August 1988), pp. 458 - 459.

⑤ Thomas Bender, “What’s Been Lost in Histor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58, No. 24(February 17, 2012), pp. B4 - B5.

⑥ Thomas Bender, “‘Venturesome and Cautious’: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1990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1, No. 3 (December 1994), p. 100; “Us Against Them”, *The Nation*, Vol. 260, No. 10(March 13, 1995), p. 35Q. “The Historian as Public Moralist: The Case of Christopher Lasch”,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Vol. 9, No. 3(November 2012), pp. 733 - 734.

后发现,他们并未移植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社会组织,欧洲的文化理想与纽约的社会历史在发生相互作用,最终使得纽约成为更具美国特色也更加国际化的美国大都市。^①作为青年学者的本德所得出的这种认识,不仅超越了当时新社会史研究范式中“从内部路径来解释历史变迁”的“内在主义”思维框架,^②而且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外来力量所产生影响的理解并不是僵化的,而是极为巧妙地平衡了国际因素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关系。总之,个人阅读史、研究主题的跨国属性等学术实践经历,将本德向跨国史研究方向推进了一步。

当然,对此时已屡获学界殊荣的本德而言,^③他的研究兴趣与志向并不会限定在美国城市史、思想文化史与知识分子等实证研究范围之内。本德对美国历史的宏大框架、史学叙事的综合也有着长期的兴趣。^④尤其是在1986年,他参与了当时由美国史学专业权威期刊《美国历史杂志》发起的关于如何克服历史研究的碎片化、过度专门化,开展新的“美国历史叙事的综合”这一争论。本德提出以“公共文化”为媒介,拓展政治史的含义,为社会史提供综合性叙事的焦点,从整体上处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一叙事策略的提出虽然很快遭遇学者们的质疑,但其宏阔的视角和学术的反思,为他后来以整体性思维模式为基础,运用跨国视角与全球视角重新思考美国历史及其写作模式提供了有益助力。

实际上,所有这些教学经历与研究实践仅仅为本德后来倡导跨国取向提供了实现的可能性,真正激发他并使他就此顺理成章地走上跨国史研究道路的,是他对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的参与。该运动起初主要是由美国两大权威史学研究机构即美国历史学家学会(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与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起的。^⑤当时,本德虽然没有阐释他对这场学术热潮的认识,但是,他此前学术实践中业已成熟的全球视角、跨国维度、宏大叙事的理论认识,尤其是他作为这场学术运动主力之一《美国历史评论》编委会委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本德对这场充满思辨的学术运动无疑抱有支持态度。因此,1996年,时任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主任的本德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的负责人。本德也从此顺理成章地站在了美国史研究国际化的前沿。^⑥

“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秉承了《美国历史评论》开展跨国学术对话的国际合作精神,“向世界开放美国历史研究”,邀请世界各地八十多位历史学家共襄盛会,共同探讨如何将美国史叙事置于跨

① Thomas Bender, *New York Intellect: 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New York City, From 1750 to the Beginnings of Our Own Tim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dolph Bourne, “Trans-national America”, *Atlantic Monthly*, Issue 118 (July 1916), pp. 86–97.

②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杜宪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5页。

③ 本德先后荣获由美国历史学家组织颁发的特纳奖,为奖励学者杰出贡献的古根海姆奖、洛克菲勒人文学奖、盖蒂学者等荣誉。1994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2008年至2011年入选美国科学院美国学术协会。

④ Thomas Bender, “Making History Whole Aga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October 6, 1985, Section 7, p. 1. “Wholes and Parts: The Need for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3, No. 1 (June 1986), pp. 120–36. “The New History: Then and Now”,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2, No. 4 (December 1984), pp. 612–622.

⑤ Ron Robin, “The Exhaustion of Enclosures: A Critiqu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 367–368;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 (October 1991), pp. 1031–1055; Michael McGerr, “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 (October 1991), pp. 1056–1067; Ian Tyrrell, “Ian Tyrrell Respond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6, No. 4 (October 1991), pp. 1068–1072.

⑥ Ava F. Kahn and Adam D. Mendelsohn, eds., *Transnational Traditions: New 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

国与跨文化的全球背景之中,更为清晰地展现“构成美国历史的多重时间框架和多元空间维度”。从1997年到2000年,该项目先后组织四次国际夏季会议,主要讨论使民族国家历史化、语境化的若干可能路径,研究成果包括《拉皮埃特拉报告》(2000年)、一份关于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的专业报告和一部综合性论文集《在全球时代重新思考美国历史》(2002年)。^① 这些成果基本都由本德亲自执笔或担任主编,其中对此前两家权威期刊的国际化运动主张各有取舍,又综合了与会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的精髓,增补了若干具有本德风格的跨国史研究理论,实践了“进一步推动美国历史国际化的关键举措”。^②

二、跨国史研究的理论构建

在执笔“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本德与国际学术界、美国学术界多位学者共同思考了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历史这一主题。在这一过程中,本德借助既有的理论资源,以专题论文、媒体访谈、学术会议等多种形式,对作为新式研究路径的跨国史进行了个人层面的理论构建。这一理论建构是从民族国家的历史化(historicizing)与去中心化(dec centering)开始的。

20世纪末的全球化现实与相关学术辩论,对社会变化和历史研究主流叙事造成了根本性冲击,超出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的解释能力。有鉴于此,与早年的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倡导者一样,本德支持霍布斯鲍姆、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等人的理论取向,将民族视为由历史构建而成的事物,而非自然的或社会固有的整体;在方法论上,努力摆脱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不再将民族国家视为封闭的、同质的容器式空间,或视为研究的预设单位和天然载体。^③ 他利用这种民族构建主义观点,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知识界关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主义的两场讨论的观察,挑战19世纪下半叶以来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历史写作模式。

本德发现,自历史学专业化以来,民族国家一直被视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背景,历史写作和

① The Conference “Project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A Joint Projec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Report on Conference II”, Villa La Pietra, Florence, Italy, July 5–8, 1998, <http://www.indiana.edu/~oah/lapietra/> [2019-06-20]; 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18, No. 2 (Summer 2006), p. 278.

②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 455. 本德对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的推动与拓展,首先是从如何准确命名“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开始的。本德认为跨国史、跨文化史、去地方化的历史等概念很难准确捕捉该项目所体现的复杂性,而且新的历史叙事应避免“将自己禁锢在另一个有限的概念盒子里”。他建议避免命名,采取一种相对开放而又模糊的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式为后来诸多的跨国史学者所认可,称赞其研究价值在于“作为一个历史概念的开放性”,其优势是有助于避免历史写作带有太过明显的目的论取向,也有利于确保学术辩论的多元化与有效性。随着其他学者越来越多地将本德归入跨国史学者的行列,他本人也逐渐接受以“跨国史”概括自己的研究,在行文之中偶尔也会使用“全球史”概念。本德从未以明确的文字对“跨国史”和“全球史”进行概念区分。在本德这里,全球史的概念具有双重性,跨国史既需要全球史作为分析背景,又因为坚持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而没有淹没在全球史学写作浪潮之中。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in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 8; Jürgen Osterhamel, “Global History”, in Marek Tamm,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p. 22;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 460.

③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New York University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September, 2000, <https://www.oah.org/insights/archive/the-la-pietra-report-a-report-to-the-profession/> [2019-06-20]

历史教学的专业实践也一直“作为民族构建的仆从”而得以发展,其学术化的目的之一是创造共同的故事,构建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然而20世纪末新兴的民族构建理论已经证明,民族国家并不是学者们所认为的固有的自然载体。所以,新的研究应该思考它是如何构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如何变化的。这也暗示着民族国家的历史是“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历史和民族国家更小的历史之间碰撞的总和或结果”。^①在这种理论构架之下,“容器”(self-contained)思维需要被民族国家“部分有界”(a partially bounded)的观念所替代,即民族的边界被认为具有一定的渗透性,更像是“接触区”而非严格的分界线;美国历史的叙事也应该从封闭的民族空间中被解放出来,可以既包含规模更大的叙事(如移民制度、资本主义或民主革命),也存在规模更小的叙事(如地方或区域)。^②总之,国家领土空间不一定是美国历史叙事充分的背景或完整的框架,历史学家也不一定要成为特定民族或国家政策的辩护者,为民族国家提供一种强调连续性和线性关系、阐释物质发展与自由扩展的目的论史学。^③

与对民族构建理论的拥抱态度不同,本德对第二个理论层面的构建则是基于对后民族国家理论的批判,这种立场牵涉到本德所认知的跨国研究的目的到底何为。同样是20世纪末关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的两场争论,也激发了知识界关于民族国家是否终结和如何写作后民族国家历史的思考。在本德看来,民族国家并不会如后民族主义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很快消失,民族国家历史也不会立刻终结;虽然它们曾经对人类共同体造成过严重的伤害,然而当前所处的世界是19、20世纪民族国家及其制度的产物,如果不将其作为一个因素考虑进去,则很难理解当下的情势。^④本德认同韦伯对民族国家的界定,承认其具备合法掌控暴力的特权,是保护人类和捍卫公民权不受侵害的“唯一的体制保障”。^⑤因此,民族国家的存在的必要性,决定着其自身仍将是历史研究的中心对象。所以,尽管很多美国学者的研究都在试图超越民族国家,探讨后民族国家历史,但本德却志不在此。他一再强调,自己的跨国研究目的不是“颠覆这个民族”,而是重新思考它的本质及它与其他实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终结民族国家历史”,而是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和教授它们,并为其建构一种别样的模式,以更好地服务于“作为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的我们”。^⑥

那么,如何处理民族国家历史与跨国史、全球史的关系呢?关于这一问题,本德基本上认同德国历史学家迈克尔·盖耶(Michael Geyer)和美国历史学者查尔斯·布赖特(Charles Bright)的观点,即警惕将民族国家历史同化到全球历史之中的做法,主张在将民族国家和全球二者视为独立过程的同时,更好地揭示它们之间的多重互动与交织。^⑦有人担心跨国史和全球史所搭建的更大框架会对美国的民族传统与制度构成威胁,对此,本德的回答与之相反,认为这种更大的框架只会有助于人们更

① Nicolas Delalande and Thomas Bende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t Its End: 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Bender”, *La vie des idées, La Vie des Idées*, November, 2008, p. 2.

②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③ 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p. 274.

④ Nicolas Delalande, Thomas Bende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t Its End”, p. 3.

⑤ 托马斯·本德《把美国放到世界中》第152页。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p. 271.

⑥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7页。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1;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History News Network*, April 20, 2006, <https://historynewsnetwork.org/blog/24185> [2019-06-07]

⑦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13.

好地理解这些传统与制度从何而来。^①

与第二个理论层面一样,本德的第三个理论层面也是运用批判思维逐步展开的。批判的对象是现实政治与史学写作中存在的“美国例外论”取向。21世纪初,美国在学术界、大众思想和政治策略上,“都有一种将美国从国际领域中排除出去的趋势”,认为除了美国之外,国际就是一切。^②本德将这一思想倾向归结为“冷战的遗产”,而且它还在影响着美国历史的整体叙事。一方面,美国史研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我者”之感,“很少向更大的历史敞开大门”;^③另一方面,在1940年之前,所有被公认的“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已然清楚美国历史是与其他历史缠结在一起的。冷战及“一致论史学”的出现打断了这一历史认知,大力提倡美国例外的思想,并主导着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美国历史研究。虽然新兴的社会史研究尝试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批评“美国例外论”,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因此本德断言,21世纪初期的美国历史研究依然“处于冷战时期的泡沫之中”。^④

本德认为,“美国例外论”取向之最深层的问题以及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暗示着美国与其他国家并不共享相同的历史。”^⑤所以,他所领导的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就是要帮助美国人采纳世界主义价值观,摆脱将美国与国际视为二元对立关系的思维,重新思考美国历史叙事。他认为自15世纪到21世纪初,美国历史与全球历史是相通的,没有一个民族存在于全球历史之外,也不存在例外的历史。^⑥显而易见,本德颠覆了美国史叙事中的“美国例外论”,他的跨国史研究视角意味着从全球历史的框架内书写美国历史,换言之,将美国历史嵌入到全球历史背景之中,证明美国不是“例外的”(exceptional),而是“独特的”(distinctive)。^⑦

总之,以上三个理论层面的构建或多或少地受到美国历史国际化运动中其他倡导者的启发,是对既有跨国史研究理念的完善与拓展;相比之下,第四个理论层面则是遵循本德多年的学术理路自然形成的,是为本德之跨国史研究的最大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国际化运动的早期倡导者大卫·西伦(David Thelen)教授拒绝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不同,^⑧本德主张拥抱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信叙事综合之必要性,从跨国的角度书写综合性的美国历史。此时的本德对美国历史叙事的碎片化和宏大叙事的缺失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策略,与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公共文化”概念存在极大的差

①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本德对待民族国家及其历史的温和立场和谨慎态度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他们把跨国史看作对民族国家史学分析框架的“必要补充”。本德对民族国家的解构与阐释,有助于“让国别史变得更有活力”并“实现国别史的‘跨国化’”。Simon MacDonald, “Transnational History: A Review of Past and Present Scholarship”, working paper, UCL Centre for Transnational History, 2013, https://www.ucl.ac.uk/centre-transnational-history/objectives/simon_macdonald_tns_review [2019-05-25]; Michael McGerr, “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p. 1057.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39页。

②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5; 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p. 269;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276页。

③ 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p. 279; Nicolas Delalande and Thomas Bende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t Its End”, p. 2.

④ Nicolas Delalande and Thomas Bende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t Its End”, p. 7.

⑤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⑥ Thomas Bender, “The Boundaries and Constituencies of History”, p. 279.

⑦ “Thomas Bender o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enter News, History News, Public Events, Washington History Seminar, *The National History Center*, December 1, 2011, <https://www.nationalhistorycenter.org/december-5-tom-bender-on-american-exceptionalism> [2019-06-02]; Thomas Bender,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History: Transnationalism vs Exceptionalism”, *RSA Journal (Rivista di Studi Americani)*, Issue 27, 2016, p. 31.

⑧ Johann N. Neem,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p. 423.

异,认为有必要“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一种超国家的背景下”,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历史的边界,书写更具历史感、更不易受目的论影响的新式历史。^①

“在这个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有勇气撰写美国大部头历史的时刻”,^②本德成为以跨国视角重新讲述美国历史宏大主题的先锋学者。当有学者批评本德“没有用‘跨国’来描述正在做的事情”时,本德其实已开始着手实践其跨国的综合性叙事,通过将美国历史置于全球历史背景之中的策略,尝试撰写一部包含跨国层面的民族国家历史。^③《万国一邦》不仅切实地向学术界展现了如何运用跨国历史的视角与路径重新理解美国历史进程,而且将本德此前对跨国史理论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历史叙事框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本德在众多跨国史学者之中独辟蹊径,“从跨国的角度寻求综合”,或者说是寻求“美国历史的跨国综合”,最终将美国学界关于跨国史的辩论“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④

三、跨国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

在学术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到底应如何完成将民族国家历史化和去中心化的跨国史研究?早在1998年,本德就直接提出了“4C”概念,即比较(Comparison)、关联(Connection)、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和分类化(Categorization)。^⑤从本德的研究成果看,他更偏重前三个概念,因为他几乎没有以更多的文字阐述分类法。即使如此,此时的本德对前三个概念的认识也是相对模糊的,至于其如何运用也不大明确。直到2006年《万国一邦》出版后,本德的跨国史研究方法才变得相对清晰可见。^⑥在这部著作中,本德对比较、关联和语境化这三个概念的运用比较透彻,^⑦“这种方法的优点与缺陷”也展示得比较充分,^⑧为总结和反思跨国史研究的策略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切入点。

首先,关于比较研究方法,与某些持否定态度的跨国史学者不同,^⑨本德认为跨国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比较史基础之上的。比较方法与跨国研究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自洽的辩证关系。从理论构思层面看,本德认为比较方法不再受制于“方法论民族主义”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比较两个国家的经验,而是将国家经验与更宏大的进程联系起来。这种比较能够使学者更加冷静客观地将美利坚民族的特殊性加以历史化,避免简单化的、武断的例外论倾向,以及使民族国家史研究

① Thomas Bender,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Syn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p. 152.

② Sven Beckert,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p. 1124.

③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④ Kiran Klaus Patel,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H-Net, 2007-1-182, <https://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21329> [2019-05-29]

⑤ The Conference “Project to Internationalize the Study of American History”, “A Joint Project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Report on Conference II”.

⑥ Sven Beckert,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by Thomas Bender”, p. 1124;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Kiran Klaus Patel, “Review of Thomas Bender”;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39页。

⑦ Petra Goedde, “Power,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40, No. 3, February, 2017, p. 10; David A. Bell, “This Is What Happens When Historians Overuse the Idea of the Network”, *New Republic*, October 26, 2013; 李剑鸣《从政治史视角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意义》,《史学集刊》2017年第6期。

⑧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39页。

⑨ Ian Tyrrell,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pp. 1035-1036.

陷入狭隘主义的危险。正如《万国一邦》的主标题所示,本德意在表明,美国及其历史并不例外,只是“民族国家之林中的一木”。^①因此,在这部以批评“美国例外论”为主旨的著作中,比较法理所当然地成为运用频率最高的方法。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其一,本德在运用比较方法时,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美国历史与其他民族国家历史的类比而非对比、相似性而非差异性、普遍性而非独特性。^②本德认为,七年战争之后,身居英帝国边陲的英属北美殖民地迅速萌发与母国的差异、疏离和独特之感。它作为民族主义的初始形态并不例外,在中东和南亚地区历史上的帝国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形。^③因此,用比较方法批判“美国例外论”与强调共享历史的关联方法殊途同归。其二,本德并未如某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无视美国历史的特殊性。^④相反,他强调对相似性和普遍性的观点并不妨碍他“在一个共同的框架之内探索独特性”,证明美国历史在分享人类通史的同时,也保有自身的地方特色。^⑤比如,在废奴问题上,与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是一个迟疑不决的后来者,而不是世界领袖。而值得关注的是,从整体来看,本德所发现的美国历史的差异与特点往往指向美利坚民族消极的一面。^⑥

其次,就关联方法而言,本德与跨国史倡导者们将“关联”作为核心方法的观点相同,认为它与比较方法对思考超越美国边界的国家与文化至关重要。关联法不是简单地拓展美国史的领域,将世界历史仅仅看作美国历史“必胜主义叙事的延伸”,更不是“出于粉饰装潢”,而是为了对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细致入微的了解,探索美国与其疆域之外的历史联系,“令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的进程”。^⑦他强调美国历史不是封闭自足的存在,而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阶段都嵌入到既存的全局背景与脉络之中。这种偏重美国以外的力量对美国历史的塑造,衬托了美国史与全球史的共时性,超越了陷于内生主义思维框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

当然,这种方法也招来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本德过多地强调美国历史与跨国历史的相关性,将宏大的全球联系与跨国框架仅仅“用于镶嵌国家的衬托”,“而非用于系统阐释因果关系的脉络”。^⑧从《万国一邦》的行文看,本德不仅关注美国史与全球史之间单向度的、由外向内的相关性,也关照美国历史与境外力量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美国与海地革命的关系便是本德利用关联方法展现这种“复杂难辨、相互促进”的历史之典型一例。^⑨美中不足的是,类似的分析在该书其他章节中并不多见。

最后,在语境化方法方面,本德认为历史学是一门语境化的学科,通过时间和空间语境解释社会变化,因此“深化美国历史的背景、扩展美国历史上的跨国关系”,成为美国历史研究国际化项目的主要目的;^⑩在本德构思《万国一邦》的写作时,“背景如何影响历史叙事”也是他最初关心的问题。^⑪按

①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7、374、376页。

② Diego Olstein, *Thinking History Globally*,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68.

③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84—85页。

④ Stanley Kurtz, “How the College Board Politicized U. S. History”,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5, 2014,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orner/how-college-board-politicized-us-history-stanley-kurtz> [2019-05-31]

⑤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vii页。

⑥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121—127、165页; Stanley Kurtz, “How the College Board Politicized U. S. History”。

⑦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托马斯·本德《把美国放到世界中》第166页。

⑧ 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全球史是什么》第40页。

⑨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123—125、134—137页。

⑩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 462;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12.

⑪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371页。

照这一方法,跨国史研究应将美利坚民族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丰富美国历史所包含的背景层次,坚持认为特定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发生的。^①从这个意义上看,语境化方法与关联方法同样突出了美国历史与全球历史的相关性。二者都是基于“民族国家并不足以构成其自身的背景”这一理念,超越并延展了民族国家的背景,在一个大于民族国家自身的框架中,将美国历史整合到全球的背景之中,从而改写了美国历史的核心叙事。^②

当然,本德对语境化方法的具体实践并不止步于此。从语义的角度看,“context”不仅指“背景”,也带有“语境”的含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都是一种偶然的、依情势而生的结果”。因此,美国史绝非一种线性的、进步的故事。其开端是一件“相当偶然、也相当意外的”事情。^③也就是说,本德的语境主义写作是通过重新定义空间维度而实现的。全球视角的引入重构了美国历史的惯常叙事。

综上所述,本德对于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意在扩展民族国家历史的时间范围和空间维度。三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其短。比较方法能够避免“美国例外论”所隐含的对美国之外的世界的傲慢态度,但对美国历史独特性的描述又往往指向美利坚民族的阴暗面;关联方法将美国史嵌入全球脉络与跨国框架之中,是实现民族国家历史化和去中心化的核心路径,然而这种关联方法使跨国关联带有自然化存在的意味;语境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关联方法所造成的先验性的风险,但本德在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并不多见。《万国一邦》是本德实践其跨国史研究方法的主要舞台,瑕瑜互见。因此,可以理解为何该书出版之后迅速引发学界的质疑与挑战,而本德也及时地给予了回应。

四、学界的质疑与本德的回应

《万国一邦》作为本德学术生涯中“最为雄心勃勃”的著作,^④将美国历史主题嵌入跨国框架之中,断言“合众国的历史只是多重历史中的一种而已”。^⑤这种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范式构成威胁的写作方式,引发部分学者的质疑。他们担忧本德的跨国研究带来的风险过高,甚至直接挑战跨国研究的存在合理性。笔者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其一,本德的研究似乎证明,“所有问题都可以以一种跨国的方式框定”。^⑥然而,对于研究某些特定问题的历史学者而言,“感觉不到历史分析范式转变的必要性”,因而没有必要迎合这一新的理论取向。^⑦只有在处理部分问题时,跨国方法可能是最恰当、可行的策略;但是,在处理美国内部某些问题时,可能无法找到其与美国之外的因素关联。因此,跨国研究方法并非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传统的民族国家史学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⑧就此而言,笔者以为,学术创新往往会伴

①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②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6页。

③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6、73、53页。

④ Johann N. Neem,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p. 419.

⑤ 托马斯·本德《万国一邦》第7页。

⑥ Robert David Johnson, “Transnational Trojan Horse”, *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 8, No. 2 (November/December 2006), p. 27.

⑦ Johann N. Neem, “Review on *A Nation among Nations*”, p. 421.

⑧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 461.

随着挑战与风险。跨国史研究在展示其价值时,难免会言过其实,因而学界出现质疑也是正常现象。

其二,该书着力刻画美国史与全球背景的关联,而对美国在观念与行动上对世界的影响,则“阐述得都不够充分”。^①这种写作方法很容易产生的歧义是:它似乎不是将跨国史视作一种视角或路径,而是当作一种预期的结果,即历史记录可以被人为操控,以服务于跨国历史研究的要求。^②所以,嵌入式写作方式一方面削弱了被用来解释美国或北大西洋国家实力增长的目的论解释模式,另一方面却发明了被用来论证跨国联系存在合理性的意识形态工具。

其三,这种做法虽然确定了跨国联系的相似性与连续性,但却遮蔽了差异性和中断性。本德运用宏大叙事展现美国历史进程如何和谐而连贯地与全球背景协调一致,又依赖大范围的比较,在强调相似性的同时,辅以一些对美国历史独特性的分析;相比之下,关于跨国联系分裂与中断的描述则相对模糊。^③

如果说,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纠偏史学观念和方法论而得以避免,那么,学术挑战则通常意味着颠覆根本性的认识论,关系到新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关于跨国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的争论,便是典型一例。本德从美国史写作和现实政治两个层面对“美国例外论”进行了严厉批评,很快便遭遇了其个人治学经历中最为严峻的挑战。在反对者看来,本德的反例外论立场不仅要求学者们遵循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案中案”(a case among cases)的文化阐释原则,将民族国家置于全球背景之下,美国历史也仅仅被视为全球历史的一部分,^④而且,本德的认识论在很大程度上轻视了美国历史的能动性与独特性,将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视为与其他所有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⑤这种淡化差异的另一面,掩盖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权力结构与悬殊的国家实力问题,因而无法解释各国的差异及其对世界近现代史影响的问题。^⑥

面对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年逾花甲的本德并未退缩,而是以不同的形式予以有力的回应。在操作方法上,他结合当下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了自己之前的一些看法。1. 本德承认,“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能被我所提出的更大的观点所阐明”,但这并不能否认海外关联的价值。比如美国革命与宪法中的许多思想就来自更广阔的大西洋世界。^⑦2. 本德并未过分强调跨国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学术优先性,而是敦促后学在探究历史时,应该从感兴趣的领域和问题入手,警惕过度关注研究时尚。^⑧3. 通过评述著名移民史学家南希·格林(Nancy Green)关于跨国商业活动的新成果,本德受其启发,认为不能像既往研究一样,过于乐观地片面关注资本、商品、人口和思想的跨国或全球“流动”,忽视

① 托马斯·本德《把美国放到世界中》,第156页。

② Michael McGerr, “The Price of the ‘New Transnational History’”, p. 1066.

③ Richard Drayton and David Motadel, “Discussion: The Futures of Global History”,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Vol. 13, No. 1 (February 2018), p. 8.

④ Peter Fritzsche, “Global History and Bounded Subjects: A Response to Thomas Bender”,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18, No. 2 (Summer 2006), p. 285.

⑤ Mae M. Ngai, “Promises and Peril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Newsmagazine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https://www.historians.org/publications-and-directories/perspectives-on-history/december-2012/promises-and-perils-of-transnational-history/> [2019-04-21]

⑥ Peter Fritzsche, “Global History and Bounded Subjects”, p. 285; Ian Tyrrell,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p. 465.

⑦ Cliopatria, “Thomas Bender Responds”.

⑧ Thomas Bender,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History”, p. 31.

其中的障碍与受阻情况,从而轻视物质和文化产品流动的复杂性。^①

此外,本德对作为冷战意识形态核心并被纳入美国研究的“美国例外论”取向,依然抱持坚定的批评立场。在2015年慕尼黑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与会学者们专门探讨“美国例外论”与跨国主义之间是否存在本德所说的巨大鸿沟,对过去几十年间致力于跨国主义的历史学家成功地挑战了“美国例外论”这一说法提出质疑。^②翌年,本德为回应这一国际会议命题,很快在评述跨国史最新成果时明确区分了“美国例外论”与跨国主义的不同,强调前者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而不是一种方法或历史发现,而后者则是历史过程,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例外论似乎依然困扰着美国人,但是跨国情感可能会限制它发挥影响力。^③可见,本德与其他学者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争论大有长期延续之态势。

本德对这些质疑的辩驳、对自己既往观念的强调,与近年来全球史与跨国史领域的自我批判性思考基本一致。2006年本德的《万国一邦》付梓之时,美国的跨国史研究“尚处在早期阶段”,学者们尚无法明晰未来几年跨国史的研究走向。^④此后,跨国史研究在多个国家、多个分支学科和专业得到了不断地发展。除了文章、著作和文集持续不断地提供经验性研究之外,也出现一些对该领域理论与方法进行整合思考的反思性成果。到2015年,跨国史研究基本步入“自我反思阶段”,很多特定的研究领域已经发表了关于跨国史缘何兴起等问题的回顾性文章。^⑤德裔英国历史学家基兰·克洛斯·帕特尔(Kiran Klaus Patel)建议冷静克制地对待这一研究风尚,告诫同道学人,跨国观点是补充而非取代民族国家历史,“不要对其抱有太多的期望”。^⑥回溯跨国视角与“全球转向”的其他学者也同样认为,应该避免夸大跨国主义史学的研究效力。^⑦整体而言,学者们在审查跨国史研究的局限性和挑战性的同时,对从更广阔的跨国和全球角度研究美国历史持有普遍的乐观态度,对采用这一研究方法的历史研究成果非常期待。^⑧

2016年是一个打破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乐观基调的年份。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浪潮极大地冲击着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促使美国学者开始更多地参与对全球转向的批判性反思。2017年,普林斯顿大学拉美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对全球史研究领域发出了哀叹,并质问该研究的兴起是否“只是一场狂欢”“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兜风”。^⑨此言一出,迅速引起学

① Thomas Bender, “Review on *The Other Americans in Paris: Businessmen Countesses Wayward Youth, 1880–1941*”,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20, No. 3 (June 2015), p. 977; Thomas Bender, *The La Pietra: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8.

② Michael Kimmage, Uwe Lübken, Andrew Preston and Britta Waldschmidt-Nelson, “A Great Divide?: America between Excep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t the Ludwig-Maximilians University, Munich, May 21–22, 2015.

③ Thomas Bender,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History”, p. 31.

④ C. A. Bayly, Sven Beckert, Matthew Connelly, Isabel Hofmeyr, Wendy Kozol and Patricia Seed, “AHR Conversation: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1, No. 5 (December 2006), p. 1457.

⑤ Kiran Klaus Patel, “An Emperor without Clothes?: The Debate about Transnational History Twenty-five Years On”, *Histoire@Politique*, Vol. 26, mai-août, 2015, p. 1.

⑥ Kiran Klaus Patel, “‘Transnations’ among ‘Transnations’?: The Debate on Transnation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merikastudien/American Studies*, Vol. 54, No. 3 (2009), p. 466.

⑦ Philipp Stelzel,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History Compass*, Vol. 13, No. 2 (February 2015), p. 79; David A. Bell, “Questioning the Global Turn: The Ca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7, No. 1 (Winter 2014), p. 3.

⑧ Martine van Ittersum, Jaap Jacobs, “Are We All Global Historians Now? An Interview with David Armitage”, *Itinerario*, Vol. 36, Vol. 2 (August 2012), p. 18.

⑨ Jeremy Adelman, “What Is Global History Now?”, *Aeon*, March 2, 2017, <https://www.aeon.co/essays/is-global-history-still-possible-or-has-it-had-its-moment> [2019-06-01]

术舆论发酵,学者们争相讨论跨国史与全球史研究是否步入了解释性的穷途末路,还是承认该领域依然处在“半巩固阶段”,存在研究困境和脆弱性的同时也具有不能抹杀的学术价值。^①

在纷杂的学术探讨中,本德对作为新式研究路径的跨国史所持有的认识获得了新的印证或讨论。就新近成果来看,爱沙尼亚塔林大学马利克·塔姆(Marek Tamm)教授认同本德对跨国史研究路径优先性保持合理警惕性的做法,认为历史是一个多层次、相互交织的过程,不同层次的历史具有不同的逻辑和节奏,历史研究最重要的不是从特定的空间框架出发,先验地将跨国研究视角与方法置于研究主题之前,而是依循思想、人物和事物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而展开研究。^②其他一些学者也认同本德对解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保持合理警惕性的做法,认为跨国主义不一定是关于开放的边界和人员、思想和商品在“后国家领域”的自由扩散,相反,这个概念还可以指向审视民族背景的话语、心态以及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思想认识。^③

综上所述,本德依循个人的学术发展理路,顺其自然地步入跨国研究领域,没有附和当时的跨国研究之风;他在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强调重构而非解构民族国家及其历史,避免夸大跨国史的研究效力;运用比较、关联和语境化方法,融合综合性叙事方式,实践跨国研究视角与路径,借以批驳美国社会与历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取向;面对其他学者对其跨国史研究方法论和认识论提出的质疑与挑战,本德重新确定了他在早年即已提出的研究视角与路径的现实关照和存在必要性,即鉴于全球化有力地塑造着当前的时代,有必要“抓住全球化为历史反思所提供的想象空间”。^④或者说,当前这一研究视角与路径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并不是自我质疑和自我纠偏,而是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与整个世界的对话”,^⑤进而实现历史书写方法的创新与发展。

(作者李敏,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邮编:130024)

(责任编辑:董欣洁)

(责任校对:张旭鹏)

-
- ① Mary Eyring, Christopher Hodson, Matthew Mason, “Introduction: The Global Turn and Early American Studies”, *Early American Stud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16, No. 1 (Winter 2018), pp. 2–3; Jürgen Osterhamel, “Global History”, in Marek Tamm,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p. 21.
- ② Marek Tamm, “Introduction”, in Marek Tamm, Peter Burke, eds., *Debating New Approaches to History*, p. 2.
- ③ Susanne Lachenicht, Charlotte A. Lerg, and Michael Kimmage, eds., *The TransAtlantic Reconsidered: The Atlantic World in Cri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3.
- ④ Thomas Bender, “Historians, the Nation, and the Plenitude of Narratives”, p. 12.
- ⑤ Eric Foner, “American Freedom in a Global Ag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6, No. 1 (February 2001), p. 16.

Stat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Scholars today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ir study-abroad experiences, let alone thei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These scholars chose some interesting topics for their PhD projects. Many had strong concerns with reality and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important debates among historians in China. A majority of topics were focused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countries. Several of these dissertations used a large number of primary documents, and adopted innov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Therefore, they were recognized by their advisers and fellow American historians. These scholars formed unique academic style after they returned to China. The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in China through teaching and involving academic work of organization.

The New Trend of Smuta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Russian Historiography // Zhou Houqin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cholars in Russia began to rethink the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y replaced “revolution” with “Smuta,” a concept that is derived from the studies of Russian history of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ey constructed a research paradigm of Smuta Studie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register the change between the time of national crisis and empire. This paradigm emphasizes that the three historical moments respectively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the early twentieth, and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ies witnessed the systemic crises of the Russian state (i. e. smuta). The first two crises ended with the rise of empire, and Russian history vacillates in the periodic rhythm of “smuta-empire”. The Smuta Studies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the upsurge of Russian Studies and Imperi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but also a response from some Russian scholars to where Russia is currently going. However, as a new disciplinary approach, its many aspects remain to be developed.

How to Write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On Thomas Bender's Transnational History // Li Min

Regarded 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uthority in transnational studies, Thomas Bender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how to write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Based on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he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t issue through two layers of analysis: theoretical construct and scholarly practice. Starting from its constructed nature, Bender has reconstructed the nation-state and its history, criticiz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promoting a transnational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he proposed a methodology of comparison, connec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and published the well-received masterpiece *A Nation among Nations*. When facing challenges and criticisms, Bender insists that transnational study is still a useful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worthy of exploration and that it enriches the scope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state historical paradigm that used to be at the center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Research on Conceptual History // Fang Weigui

Conceptual history, also known as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Germ.: *Begriffsgeschichte*), is a well-known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It is especially the German “model” of conceptual history that is highly regarded worldwide; it is often cited as an exemplary research method. While it is becoming gradually internationalized, we can observe a constant effort to adapt it to the distinctive histo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local. At the same time, conceptual historical theory has not yet been able to solve some problems, and they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rgent. In its recent practice in China, it is widespread that researchers often rely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If one overlook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ual historical method, the relevant “truth” of history is very unlikely to be discovered, however. In this contex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 deserves attention, as we believe that the two deal with different questions and concern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rms is an intrinsic challenge. See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one could argue that historical semantics has to be based on a complicated transregional research process; in return, which poses a meaningful challenge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onceptual history.